

盛力

一、引言

本人十分榮幸受邀為本期的特邀主編，主持“澳門立法會選舉”專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是立法會選舉中非常特別的一屆，其首次將“愛國者治澳”原則全面貫徹落實於立法會選舉中，補充了“愛國者治澳”的保障機制，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第6條第8款規定：“拒絕聲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者；或事實證明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者無被選資格。”為確保所有參選人均為“愛國者”，選管會制定了《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審核準則》，對所有參選人進行了嚴格的資格審查，對部分參選人的被選資格提出異議，通過其自動退選或終審法院裁定，最終確定了“愛國者”候選名單。同時，本次立法會選舉在史無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舉行，澳門於選舉投票前一個月發現多宗新冠確診病例，並啟動了首次全民核酸檢測，為疫情籠罩下的選舉增添了變數。

最終，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克服重重險阻，於2021年9月12日如期舉行。本屆選舉的基本選情如下：在具投票資格323,907名選民中，有137,279名選民投下直選選票，投票率為42.38%。同時，本屆選舉共產生了33名議員，其中包括14名直選議員、12名間選議員以及7名由行政長官委任的議員，政治版圖發生變化，“民主派”出局，各主要行業領域、土生葡人族群等在立法會均有代表。其中，在直選議員的14個議席中有一半新面孔，代表澳門社會各階層各團體的新生力量不斷湧現，在競選中不乏針砭時弊和直諫施政不足的聲音。然而，在嚴格的防疫監控措施、不利天氣、年輕選民增加以及所謂DQ事件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本屆選舉的競選規模和範圍受到影響，投票率亦有所走低。

簡言之，作為“一國兩制”下澳門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又一里程碑，澳門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順利舉行對澳門政局具有深遠的影響。回顧本屆選舉，在選舉過程中存在着甚麼影響因素？本屆選舉呈現出怎樣的新特點和新趨勢？以及其對今後的立法會選情將產生怎樣的影響？本期《澳門研究》專欄推出的八篇文章，將從不同方面對此進行剖析。

二、本期內容

第一篇文章是婁勝華的《疫情、DQ 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文章從宏觀整體的角度分析了本屆選舉的獨特情況，認為第七屆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實現了立法會議員結構的調整及優化，而受疫情等因素影響，競選宣傳方式發生變化，線下的聚集性宣傳減少，線上宣傳增加；各參選組別政綱聚焦於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就業不足、民生艱困等議題。同時，直選投票率大幅下降。面對大量選民散居境外的現實以及投票率低迷的狀況，建議考慮引入強制投票制度與通訊（郵寄）投票方式。

一直以來，澳門立法會由直選、間選和委任議員組成，選舉制度受到澳門獨特的歷史環境以及其倚賴的本土資源的影響。本期的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陳震宇的《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以及郭善文和溫天鵬的《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便從直選和委任的角度對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制度進行分析。自1976年至今，澳門立法機關使用漢狄比例代表制作為立法機關直接和間接選舉的議席分配方法，並發展出一套澳門獨有的分配模式，陳震宇的《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稱之為“澳門漢狄法”，但此法是否最符合澳門的現實需要？該文嘗試以各種不同的比例代表制議席分配方法，模擬2021年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直接選舉的議席分配，結果發現經澳門本地改良後採用的漢狄比例代表分配方法，其應用在整體而言是成功的，其分配結果也基本符合澳門的現實情況，特別在界別利益分佈方面，能基本達至最大程度的均衡。委任議員制度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產生途徑之一，在澳門回歸後得以保留。對於直選和間選的研究相對較多，而委任議員方面則相對薄弱，郭善文和溫天鵬的《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從歷史制度主義來審視委任議員制度。文章將其發展歷程分為萌芽、漸成、確立以及轉變四個階段，其中“《澳門組織章程》的頒佈”和“澳門回歸”為兩個關鍵節點。在此過程中，委任議員制度受到了“管治需求的強化”、“華人社群與華商實力的壯大”、“社團與社團政治的崛起”以及“民意機關的內生性需要”四大因素的影響與制約。

立法會直選結果一直為人們所關注。澳門地方細小，基本上只得一個選區，因此候選組別政綱傾向為“包羅萬有”、“面面俱到”，各組別政綱的差異性並不太突出；澳門特區的行政規劃主要沿襲回歸前堂區的設置，根據選民分佈情況在七個堂區分別設置票站，各區人口成份各有不同。是甚麼影響着選民的投票習慣？各候選組別的競爭性又被甚麼因素左右？本屆選舉在新冠疫情下進行，又有候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總體投票率有所走低，究竟是甚麼原因影響着本屆選舉的結果？本專欄的第四至第七篇文章，分別使用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作出探討。霍偉東和黃偉棋的《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運用量化研究方法探究投票習慣和選舉競爭對本屆選舉投票率的影響。發現第七屆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的票站投票率與選民投票習慣和選舉整

體競爭狀況呈正相關關係，與“民主派”的支持程度呈負相關關係。然而，上述關係並無法在第二屆至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的得以體現，甚至呈現出與一般選舉研究“反常”的情況。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基於改良漢狄法的澳門選舉制度給予參選的政治力量無需追求“選票最大化”的策略選項，使得選舉競爭程度在澳門多年都無法發揮提升投票率的作用。但是，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卻“意外”提供新的政治競爭空間，使得選舉競爭重新對投票率產生積極的刺激作用。蔡永君和何偉鴻的《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以2013、2017和2021年立法會當選議員組別背景為視角，利用各組別在不同區域獲得的有效票數，計算標準化發生比，分析和比較當選組別在各區域的“吸票”能力，瞭解各組別的得票是否具有區域性差異，以及有關“吸票”能力和競爭力是否具持續性。結果發現在現時各候選組別政綱仍大致相近的情形下，不同組別在各區的得票情況大相逕庭，而選民投票取向與組別性質背景具有一定的連繫性，但未能確定具強烈的關係，同時，在區域的“吸票”能力和競爭力分佈上則保持較高的穩定性。鄭錦鈞的《政治文化與投票行為——以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嘗試使用公民政治文化理論分析本屆立法會選舉出現歷史性的高白票率的其中一個原因，文章認為是選民的“村民型”政治文化所致，過往幾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並不一定與選民的履行公民責任有關，更多的是出於其他多種原因，當中候選人的競選策略和動員能力是常見的主要因素。史超宇和陳建新的《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也關注相同問題，文章認為本屆選舉投票率較低是受到選民預期成本和期待效應的影響，而白票和廢票並沒有存在突出數量問題，選民投白票和廢票歸因鐘擺效應。

最後，在競選宣傳方面，徐勁飛和潘越的《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2017及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使用定性比較分析法，抽取2017與2021兩屆立法會候選組別的宣傳片進行多要素條件組態分析，結果發現當宣傳片以候選人形象多樣性與鏡頭剪輯技巧為核心要素、以訴求策略多樣化為輔助要素結合而成時，說服效果最好。

三、結語

立法會作為大眾市民向政府表達意見的管道，議員擔當着促進政府與居民溝通橋樑的角色以及推動澳門特區善治的功能。在新時代背景下，新一屆議員作為特區政權架構的重要成員被寄予厚望，責任更大，任務更重，將在匯聚民智、反映民情以及監督施政等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四年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是澳門居民行使政治權利的一個重要方式，目的在於使政府政策在最大程度上合符廣大居民的利益和願望。完善的選舉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治理團隊是維護澳門社會整體利益、團結各方力量的保障，有助於激發各界建設澳門的動力，為澳門經濟發展、社會民生保駕護航。立法會進行的任何一個討論和決策，都影響着澳門的經濟民生和未來發展。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持續反覆之下，澳門旅遊業的發

展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進程受到影響，經濟和社會民生需要在突破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下砥礪前行。當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實施方案公佈為澳門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澳門未來發展危中有機，新一屆議員在履職中挑戰與機遇並存。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推動新一屆議員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施政，有效提升澳門治理效能，督促特區政府增強緊迫感和主動性，抓緊共建橫琴深度合作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逐漸融入國家戰略大局，最終確保澳門“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這對於澳門立法會和新一屆議員來說也是一次重大的機遇和挑戰。